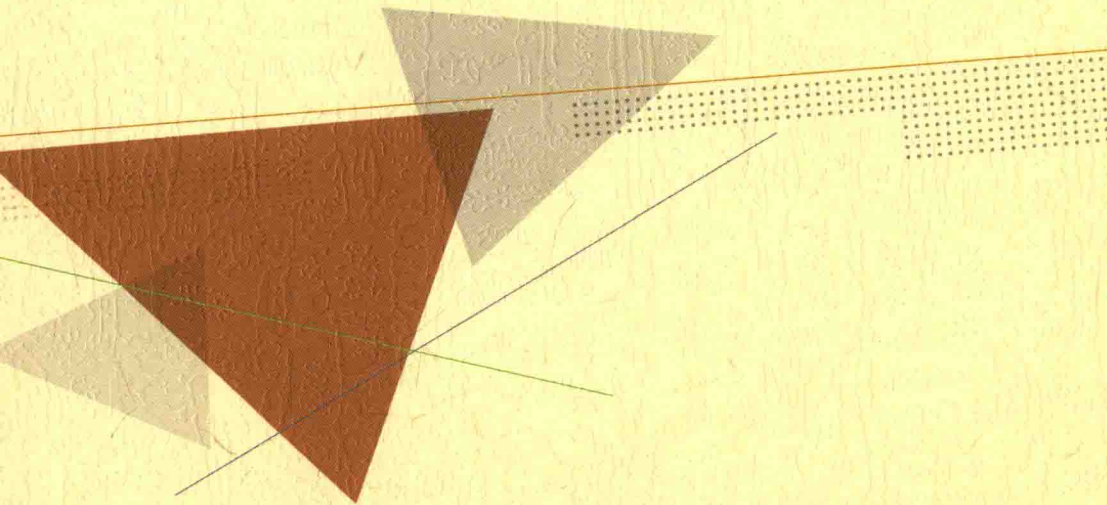


西方左翼视域中的 当代中国与社会主义

范春燕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西方左翼视域中的 当代中国与社会主义

范春燕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方左翼视域中的当代中国与社会主义/范春燕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1

ISBN 978 - 7 - 5161 - 9234 - 4

I. ①西… II. ①范… III. ①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②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B089. 1②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65237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刘 艳
责任编辑 刘 艳
责任校对 陈 晨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1
插 页 2
字 数 155 千字
定 价 3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言	(1)
一 为什么是“左翼”？——关于研究对象	(1)
二 以理论为主线还是以问题为主线？——关于研究 路径	(3)
三 正文结构和主要内容	(4)
第一章 市场社会主义：旧话题与新实践	(8)
第一节 市场社会主义何以可能？	(9)
第二节 市场社会主义和中国模式	(26)
第二章 世界体系论：资本主义的体系性危机和中国的 当代崛起	(37)
第一节 资本霸权的“末世”和中国的“新东亚道路”	(39)
第二节 “中心—外围”的不平等和中国的新“脱钩” 战略	(57)
第三节 新帝国主义的“时空修复”和中国崛起的 可持续性	(68)

第三章 海外中国学左翼：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77)
第一节 海外中国学左翼的研究方法	(79)
第二节 毛主义和经典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连续性	(85)
第三节 邓小平理论和毛主义之间的连续性	(95)
第四章 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后”时代的中国和社会主义 ..	(104)
第一节 对后现代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107)
第二节 对替代性的思考：后社会主义战略	(117)
第三节 后现代氛围中的中国和社会主义	(123)
第五章 左翼激进哲学：对毛主义和“文化大革命”的反思 ..	(129)
第一节 几种流行的左翼反思路径	(129)
第二节 左翼激进哲学的反思：从毛主义到后毛主义 ..	(139)
参考文献	(160)

导 言

一 为什么是“左翼”？——关于研究对象

本书的研究缘起主要受到两种研究路向的激发。一是“国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①。这是近年来国内学界新兴的一个研究门类，此类研究的一般思路是：随着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断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国外学者围绕中国的研究和争论也越来越多；作为“局外人”或“旁观者”，国外学者的分析视角和研究路径往往有其独到之处；因此有必要对他们的一些重要观点进行引介和梳理，以找到其

^① “国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可以视为“海外中国学研究”在当代的一个发展分支，主要依托相关的科研机构和高校的研究中心展开（比较有影响力的科研机构和研究中心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中央编译局的“海外理论信息中心”、国家图书馆的“海外中国问题研究资料中心”、上海社会科学院的“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北京联合大学的“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等），近年来相继推出了一系列具有“品牌效应”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海外人士谈中国社会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海外邓小平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国外关于邓小平理论述评》（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海外邓小平研究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以及中央编译局在2002年和2011年出版的两套系列丛书，一套是2002年的“海外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经济改革研究丛书”（包括《海外学者论中国经济特区》《海外学者论浦东开发开放》《海外学者论中国经济和改革》《海外学者论中国改革开放》），另一套是2011年的“海外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包括《民主的长征：海外学者论中国政治发展》《执政的转型：海外学者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增长的迷思：海外学者论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建构：海外学者论中国模式》）。

中一些有价值的“他山之石”。

二是“面向中国问题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近年来一直都是国内学界关注的热点领域，而提出“面向中国问题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一方面是为了把国外理论和中国实践相对接，从而增强理论研究的现实感；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更好地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一些具有批判精神和替代性探求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大都具有世界社会主义情怀，而且中国作为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也一直是他们重要的理论参照点，因此，如果不回到中国问题，就无法全面把握这些学者的理论建构。^①

结合上述两种研究路向，本书把研究对象限定在“西方左翼”的范围内。这不仅是因为西方左翼学者对当代中国与社会主义的研究学理性强且具有整体性视野，选取他们作为研究对象，既可以规避此类研究重资料、轻理论的弊端，也可以超越个案研究的狭隘性；而且，更重要的是，西方左翼学者往往是把中国问题置于世界社会主义的大背景下来考察，把中国的当代实践和替代性探索相联系，因此更为切合“社会主义”这个主题。

但“西方左翼”仍是一个稍显宽泛的概念，本书在选取具体的研究对象时，重点考察了那些具有马克思主义渊源和社会主义关切、并在西方学界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原创型左翼学者。在这些学者中，有阿里夫·德里克、萨米尔·阿明、莫里斯·迈斯纳、戴维·施韦卡特等长期关注中国问题的左翼学者，他们对当代中国与社会主义都有专门性研究，且本身在学术上又达到了相当的理论高度，因此属于本课程的主要研究对象。此外，还有另外一些学者，包括大卫·哈维、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阿兰·巴迪欧等人，可能他们的著作中并不经常

^① 参见汪行福《面向中国问题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8月27日。

出现“中国与社会主义”等字样，但由于他们对中国问题有所涉猎，且都是极富时代特征和影响力的原创型理论家，因此，本书也把他们纳入了考察范围。或者说，对于此类学者而言，尽管他们关于中国与社会主义的直接论述并不多，对中国的一些具体问题也没有详尽的分析，但鉴于他们理论的原创性和完整性，仍然具有较高的研究和参照价值。

二 以理论为主线还是以问题为主线？——关于研究路径

从上述研究旨向和研究对象出发，本书可以依据两条线索行文布局：一条是从当代中国与社会主义的一些具体问题入手，考察西方左翼不同学派围绕这些问题的各种看法和争论；另一条是从西方左翼的理论派别人手，考察同一理论框架下围绕中国与社会主义问题的一些带有共性的观点。

这两条线索都各有利弊。以理论为主线的研究，其优势在于能够较好地把握西方学者的观点，弊端在于不能就中国与社会主义某一方面的问题展开正面分析，以及围绕这一问题进行比较性研究。以问题为主线的研究（即专题性研究）则相反，能够很好地就某一问题展开较为深入的探讨，但缺点就是容易产生对原著的暴力阅读和硬性剪裁，以及得出一些过于简单化的结论。

经过综合考虑，本书采取了“以理论为线索兼顾问题”的研究路径，即主要是从西方左翼某一流派及其理论出发，考察他们针对当代中国与社会主义相关论题的研究方法、论证过程以及逻辑结论。“以理论为线索兼顾问题”，一方面能够最大限度地深入西方学者的语境，了解他们的理论符码和理论脉络；另一方面，由于每个流派内部也有一些相对集中的问题域（如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市场

化改革的问题域、世界体系论及其中国崛起的问题域、海外中国学左翼及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域)，因此也能观照到一些具体问题，并对之进行相对集中的研究。

即便如此，“从理论出发兼顾问题”相对于本书的研究主旨而言，仍然具有研究路径上的缺陷。比如，由于每章都是从西方学者的相关理论出发，对理论的引介和评述着墨过多，以至于从某种角度来看，似乎成了“以中国问题为线索的西方左翼理论研究”。此外，由于文章结构所限，尽管每一章都有一个相对集中的问题域，但却没有能够就此一问题域展开比较性研究。对于这些缺陷，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也试图进行一定程度的弥补。首先，尽管是以理论介入，但每章都尽量明确一个围绕中国问题的主题，或是以某个中国问题作为理论的“落脚点”。其次，在对某一理论派别进行研究时，尽可能补充其他派别对此类问题的一些相同或不同的看法（比如在“市场社会主义”一章中补充了“世界体系论”的相关论点，在“激进左翼哲学”一章中补充了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和海外中国学左翼的相关论点）。最后，尽可能地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对不同流派的观点进行评析，以获得基本方法论上的一致性。

三 正文结构和主要内容

本书重点考察了五个西方左翼流派及其对当代中国与社会主义的相关研究，主要包括：“市场社会主义论”及其对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研究、“世界体系论”及其对中国崛起问题的研究、“海外中国学左翼”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及其对“后”时代的中国和“后”社会主义的研究、“左翼激进哲学”及其对毛主义和“文化大革命”的研究。

第一章“市场社会主义：旧话题与新实践”，通过回溯两种不同

的对过渡时期理论的理解，引出两种对市场社会主义和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截然不同的看法。实际上，在西方左翼中，无论是市场社会主义的赞同者还是反对者，基本上都认可在资本主义和具有自身基础的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一个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描述过的具有制度“混合性”特征的过渡时期。市场社会主义论者认为，市场和社会主义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冲突，“混合性”体现了市场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合作，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过渡”这个词语本身就意味着通向未来社会的每一步都具有实际的意义。但对于反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学者而言，“混合性”则体现着市场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在他们看来，市场和社会主义分属两个不同的价值体系，过渡时期也总是充满着变动且极不稳定，因此，过渡时期体现的是一种“两难性”而不是“两可性”。对于当代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市场社会主义论者倾向于把他们的理论模型应用到中国这个实例上，即通过中国这个“新的试验场”把市场社会主义从一种理论建构转向一种实践性探索；而反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学者则认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已经使中国和社会主义渐行渐远。

第二章“世界体系论：资本主义的体系性危机和中国的当代崛起”，主要是从当代世界体系论的视角出发考察中国崛起的背景、根源和前景。世界体系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其核心内容是强调以世界体系为单位研究历史资本主义的演进规律，同时也以世界体系为单位考察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路向。当代世界体系论的几个主要代表人物，包括萨米尔·阿明、乔万尼·阿瑞吉、大卫·哈维等人，都十分关注中国的崛起，并在各自的相关著述中分析了中国崛起的根源、动力、前景和世界历史意义。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把中国的崛起置于资本主义体系性危机的大背景下去考察，同时也以中国的崛起为切入点追踪世界体系的当代演化。不同之处在于：阿瑞吉从体系积累周期出发强调新一轮霸权更迭的特殊性和中国所代表的“新东亚

道路”；阿明从“依附论”出发审视当代中国的新“脱钩”战略和替代性探索；哈维则从新帝国主义的弹性生产机制出发讨论了中国在新一轮“时空修复”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中国崛起的后续性发展。

第三章“海外中国学左翼：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主要考察了海外中国学左翼（包括莫里斯·迈斯纳、马克·塞尔登、阿里夫·德里克等）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中国社会主义的研究。海外中国学左翼在研究方法上具有一些鲜明的特征。首先，他们主张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角度出发考察中共党史，反对一种“权力斗争说”，即反对从派系斗争出发来看待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其次，他们主张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视角出发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进行比较性研究，反对一种从官方文献出发的“注释式”研究；再次，他们主张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视角出发考察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反对仅仅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和市民社会理论出发解读中国的发展问题；最后，他们主张整体性研究，即把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百年史作为一个具有连续性的历史时期进行总体性考察。

第四章“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后’时代的中国和社会主义”，主要考察了德里克、詹姆逊、哈维等人从马克思主义出发对后现代主义的诠释，以及对“后革命”氛围下的中国和社会主义相关问题的研究。以詹姆逊为代表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强调后现代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之间的同构关系，指出了后现代哲学背后的资本逻辑。他们认为，后现代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对于这个新阶段，他们分别从晚期资本主义、灵活生产机制的资本主义、全球资本主义等角度进行了分析）的典型意识形态。在他们看来，后现代并没有开启一个现代之后的新时代，后现代主义也不能表达一种基于资本逻辑转换的时代更迭，后现代思潮毋宁说是全球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典型意识形态。在后现代氛围中，新政治不再需要一种建立在对抗逻辑之上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二分法”，而是呼唤一种

“模棱两可”的政治，即与晚期资本主义逻辑相适应的具有开放性和灵活性的政治。由此，德里克提出了“后社会主义”的观点。所谓“后社会主义”，在他看来，首先就是“后革命”时代的社会主义，其次是在和“元理论”对立的“后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德里克指出，“后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模棱两可”的政治策略主张开放性和“两可性”，与中国的当代实践相对应。在他看来，把中国视为“后社会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或新儒教社会，更加符合当代中国的实际。此外，由于当代资本主义转向空间化生产和灵活积累模式，中国的“后社会主义”也提供了此一背景下的一种“弹性”政治的范例。

第五章“左翼激进哲学：对毛主义和‘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主要考察了当代左翼激进哲学从毛主义转向后毛主义的理论轨迹，以及对“文化大革命”的批评性反思。以巴迪欧为代表的激进左翼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文化大革命”作为20世纪一系列“晦暗不明”的政治事件之一必须加以阐明，但不是通过将之逐出思想和政治领域，而是要从激进政治序列的更迭、真理和事件的辩证关系上进行新的讨论；第二，“文化大革命”的失败说明20世纪以“共产主义观念的实现”为宗旨的整个激进政治序列（从1917年到1969年）已经耗尽了其可能性，因此要对这一政治序列进行整体性反思；第三，以“文化大革命”为终结的政治序列所留给我们的主要教训就是，作为“大写的一”（UN）的真理并不存在，政治不能和历史（也不能和艺术、爱）相“缝合”，也不能强迫为“不可命名之物”命名。在反思的基础上，巴迪欧发展出了一套较为系统的左翼激进哲学，其特征就是在数学本体论之上重建真理、事件和主体的三位一体，并提出一种后毛主义政治观，试图重建以“减法政治”和“无党派政治”为特征的新的激进政治。

第一章

市场社会主义：旧话题 与新实践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以泰勒、兰格为代表的西方改良主义经济学家在和自由派学者的争论中，就曾经提出过一种“市场 + 社会主义”的理论模型，即在市场经济中引入公有制，以“市场社会主义”替代“市场自由主义”来解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二战以后，东欧和苏联的一些学者把这种以西方制度为核心考量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型移植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化改革之中，提出“社会主义 + 市场”的概念，主张在公有制条件下引入市场机制以克服僵化的中央计划体制和僵硬的工厂等级制度等。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苏联和东欧的市场化改革逐渐脱离社会主义轨道，一些西方左翼学者也开始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提出质疑。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根本就没有商品、货币和市场，即便承认市场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意义上可以暂时存在，那也是需要克服而不是加以巩固的情势，因此并不存在一个稳定的市场社会主义阶段；市场和社会主义分属两个不同的价值体系，硬把二者连起来，只能得出一个悖论或是指向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而另一些赞同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学者却持不同看法。他们认为：市场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过渡时期的基本制度形

式；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化改革所遭受的挫折并不是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本身的问题，而是没有在实践中贯彻这一理论所导致的；市场社会主义不仅是必需的，而且是当下唯一可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形式。一些市场社会主义论者还把目光投向中国，认为中国作为市场社会主义新的“试验场”，正在从实践上印证这一理论的可行性。

第一节 市场社会主义何以可能？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左翼学者围绕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展开了一系列的争论。他们争论的主要问题有：苏联和东欧的失败究竟是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在践行中出了问题，还是理论本身就有问题？市场社会主义是否能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过渡时期经济形式的“混合性”上去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过渡时期究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还是一个短暂的状态？在没有达到“具有自身基础”的共产主义之前，市场社会主义作为“过渡”是否具有方向上的“两可性”？苏联和东欧市场化改革的挫败所折射出来的问题究竟是经济基础的问题，还是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问题？市场社会主义是否能够同时作为自由资本主义和苏联模式的替代性选择？市场社会主义究竟是唯一可行的现实选择，还是一种温和的乌托邦想象？

对于参与到市场社会主义争论中的西方左翼学者而言，关于上述问题的不同回答构成了赞同市场社会主义和反对市场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实际上，这两大阵营都试图通过对历史和理论的反思找到一条既超越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又超越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替代性之路；但他们的分歧也十分明显，也就是：市场社会主义能否担当此任？

一 市场社会主义的理据和可行性

几乎所有的市场社会主义论者都认为：市场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专

属，它即便不是一个中性的工具，也是可以被社会主义加以驯服和利用的；由于市场本身具有不同的部分（劳动力市场、商品和服务市场、资本市场等），因此可以对不同部分采取不同的限制措施，只要保证公有制占主体，市场并不会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在市场社会主义模型中，“市场”是作为苏联模式中的中央计划的替代出现的，而“社会主义”即公有制又保证了其相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因此，市场社会主义既超越了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又超越了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理论来看，市场社会主义也符合他们所描述的过渡时期的一些基本经济特征，或者说，在他们那里，市场社会主义是通向完备的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1. 市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过渡”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主要基于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化大生产和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之间的矛盾——的认识。他们认为，未来社会作为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克服，将以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代替私人所有，个人劳动也将直接以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存在，而不必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只有以商品、货币和市场为中介，才能完成个人劳动向社会劳动的转化。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这种关于未来社会的逻辑推论又进行了一些补充，他指出：这种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并不可能一下子达成，而是需要一个初级阶段作为铺垫和过渡。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新社会，“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①，比如仍然存在着以劳动为尺度的交换，以及由此衍生出的脑体分工、贫富差别和权利上的不平等，作为一个初级阶段，它有待于在自身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来看，他们所说的这个初级阶段并不是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4页。

充满着暴力斗争的“革命转变时期”，而是已经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出来的新社会。作为一个新的生命体，它虽然还没有经过自身的充分发展，但已经具有自身的基础：从生产方面来看，私人不占有生产资料；从交换方面来看，也不是以货币而是以劳动券为中介进行交换，由于交换是在工作场所进行，因此也不需要分化出一个专供交换的市场；在社会政治方面，国家已经走向消亡，贫富差距、脑体分工以及“资产阶级法权”只是在一定限度内存在，权利的不平等不会导致阶级差别的产生。总之，这个初级阶段的“不纯粹”并不会导致一种“两可性”局面的出现（或是通向更高阶段的社会主义或是退回资本主义），而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确保能够通向社会主义，或者说，已经没有了重新回到资本主义的风险。

但是，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来看，都没能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包括他们所说的初级阶段。因为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并没有消除分工、交换、阶级和国家，因此也可以说，人类社会迄今为止都没有见证过一个具有自身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是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描述的从资本主义社会转向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转变时期的一些特征，不仅仍然存在着市场、商品和交换，存在着私有和公有的混杂，还存在着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斗争，即存在着“两可性”——并不能保证必然通向马克思和恩格斯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因此仍然需要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在发展生产力和改造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确保过渡的方向性。^①

实际上，无论是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赞同者还是反对者，基本都认可在资本主义和马克思所说的具有自身基础的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一个具有制度“混合性”特征的过渡时期。但对一些反对市场社

^① 参见智效和《混淆“过渡时期”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后果》，《理论学刊》2005年第2期。

会主义理论的西方左翼学者而言，这个过渡时期体现了革命转变时期的变动和不稳定性，其内部的资本主义因素和社会主义因素的斗争也很激烈，如果社会主义不能在短时间内胜出，就会退回资本主义。换言之，对于这个革命转变时期而言，即便存在市场和社会主义的共存，也是极其短暂的，而一旦过渡完成，社会主义在自身基础上获得向前发展的动力，就失去了市场社会主义存在的经济基础，因此完全没有必要确立一种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框架。

而对于赞同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西方学者而言，过渡时期不仅漫长，而且会呈现出阶段性和逐步过渡的态势，或者说，过渡时期作为革命转变时期，不仅有斗争和冲突的一面，也有发展和稳定的一面。他们认为，在最初的暴力革命（夺取政权、镇压叛乱分子）之后将会出现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尽管这个革命后社会的长远目标是实现不存在市场的社会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的理论本身就是承认，如果没有市场社会主义作为中间阶段和桥梁，不存在市场的社会主义也就是完备的社会主义就只能是乌托邦。或者说，“过渡”这个词语本身就意味着通向未来社会的每一步都具有实际的意义。

如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会主席詹姆斯·劳勒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讨论中就明确指出：过渡时期之所以是一个漫长的、逐步发展的过程，主要是因为私有制以及市场、货币等形式并不能靠法令强行取消。他援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原理》中的一些说法，认为过渡阶段应该“限制”私有制而不是“消灭”私有制，私有制是“自行灭亡”的，财产也是逐渐转移到无产阶级手中的。^①在他看来，革命后社会的本质任务就是“无产阶级国家通过与资本主义企业的竞争来取得财产”，其主要

^① [美] 伯特尔·奥尔曼编：《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段忠桥译，新华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9—31 页。